

安徽大学管子研究文库

郭因 龚武 主编

管掌论集

上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管掌论集

GUAN XUE LUN JI

上 卷

郭因 龚武 主编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 代 出 版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时 代 出 版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学论集/郭因、龚武主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461 - 1189 - 6

I. ①管… II. ①郭…②龚…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①B22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2702 号

管学论集

郭 因 龚 武 主 编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230071

印 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 × 1000 1/16

印 张:29.5

字 数:51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 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管学论集》上卷编委会

顾问：刘树生 熊德超
编委会主任：郭 因
编委会成员：鹿 刚 解家选 苏凤捷 周怀宇
 江多晨 崔 黎 张华久 曹 伟
 龚 武

主 编：龚 武
副主 编：王克彬 王月宇 汪振鹏 石家友
编 辑：曹 磊

《管学论集》上卷编辑说明

一、本书收录 2006 年以来管子学术研讨会或《管子研究》刊发的部分文章。

二、按质量取稿,以求反映学术档次和学术品位。

三、照顾到面,考虑学会会员群体性特征。

四、尽可能多刊发在校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文章。

五、入书论文以有注释和参考文献与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之。对有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论文,按照论文规范格式发排。

六、论文前置摘要和关键词的,依照原文编排;没有的则不另加。

七、根据学会“三管”齐下的学术宗旨,本书以“管子通论”(把管子作为历史人物和《管子》文献结合一体,不加区分看待的学术论文)、“《管子》文本论”(就《管子》文本抽绎论题而加以研究的论文)和“管子文化论”(就管子其人其事其书与同时代的关系或对后世的影响加以研究的论文)三个部分大致分类编辑,相关文章归于相应的部分。

八、冯传礼整理编写的《管鲍传说》,作为文体,属于故事,不是论文;但作为口碑传说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管学文集不可缺少,故以附录收入。

序 言

郭 因

序
言

对管子其人,孔子、孟子早有议论。对《管子》其书,历代也不乏学人进行研究。汉代司马迁说,他读过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并据此认为管氏是个能做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的人。汉代刘向除指出“《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外,肯定《管子》一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宋代以后,不少学人对《管子》一书是否为管氏所作,多所怀疑,甚至对此书是否反映了管氏思想都心存疑惑。就近、现代大家所熟知的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几位学者来说:梁启超认为《管子》一书“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胡适认为梁说“殊无根据”,而认为“《管子》书中学说乃周末最后之产儿,绝非管子时代所能发生”。“太史公所言尝见《管子》诸篇,不足为据”。冯友兰认为,《管子》这部书“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这部书中,各家各派的论文都有”。“其中法家思想,黄老思想占主要地位。但也有别家思想,还有儒家思想”,“它成书的年代和《吕氏春秋》成书的时代可能差不多”。冯氏认为“《管子》里面没有管子亲笔写的文章”,但认为“其中也有可以作为讲管仲本人的思想和活动的材料”,如《大匡》、《中匡》、《小匡》三篇。侯外庐则断然认为“今存《管子》一书,决不能据以论证管子的”。因此,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就根本不谈管子。

我比较赞同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所提出的观点:“读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何人所著。”诚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说:“古人并无亲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集。”

我认为,只要《管子》中说是管氏的言论,那些言论又可从管子毕生的事功中得到验证,就都可以认为全是管氏的思想观点,完全可以据以论证管子。

至于管子到底是道家,是法家,还是兵家等等,研究者不妨各持各说。我倒赞同近人黎翔凤的观点:“《管子》内容博大,体系整饬,超越九流诸家之上。”我进一步认为,管子可称为古代治国大师,他的思想观点全是围绕治国需要展开的,《管子》一书中含有后来的道、法、儒、兵各家的思想观点,正说明在管子这里只要为治国所需,各种思想观点他是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

而在他之后,各个学派各持一端,以致道家“玄而又玄”之说难以济世;儒家只重德治之说,难以用世;法家过分尊君主、抑臣民之说,难以延世;兵家如不重“攻心为上”、“止戈为武”之说,则将祸世。就因此,时至今日,人们愈来愈觉得管子的治国思想与事功,特该重视,特该研究。

比起管子在那里建立了伟大事功的山东来,安徽学术界对管子其人其思想,重视较迟,研究起步较慢,研究队伍较小,研究成果更是又小又少。安徽的管子研究会是直到2008年才由县级学会升格为省级的,秘书处仍一直放在颍上县。

近年来,安徽对管子较有研究的同志以及省外管研专家,在参加研究会的年会时带来、宣读了一些文章,在会刊《管子研究》上,平时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研究会近日从这些文章中选了若干篇,成了一本书,这可算是研究会同仁们第一本论文结集。不管水平如何,质量如何,我们总算是有了一个研究会的初步的集体成果。我们十分盼望国内外研究管子的专家能拨冗读读我们这本集子,并不吝指教。

2009.10.10

导言：读管子

一、管仲其人

管子(前 723 - 前 645), 名夷吾, 字仲, 尊称仲父, 谥敬, 称敬仲。新时期被学界誉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 中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千古名相。生活于公元前 8 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 7 世纪中叶, 享年 78 岁。从公元前 685 年桓公拜相起, 到公元前 645 年病榻论相逝世, 相齐 40 年。

根据明、清和民国《颍上县志》记载: 管仲出生于颍上管谷, 即今安徽颍上县境内颍河右岸管谷湾周遭, 父亲管严, 母亲谷氏。管仲幼年丧父, 家境贫寒, 与母亲相依为命。

管氏的远祖可追溯到管叔鲜。殷商时代, 管叔鲜被指派, 名义上辅佐纣王子, 实际上监督纣王子, 叔鲜后与纣王子密谋叛乱, 周公旦平叛杀叔鲜。叔鲜后裔避难潜逃, 有一支流落到颍上。据浙江青溪《管氏族谱》记载, 管仲系颍上管氏第十二代孙。至今管家庄和鲍庄还恪守“管鲍两家不通婚”的习俗(众所周知, 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也不通婚)。管、鲍于公元前 698 年(干支纪年癸未)离开颍上, 古民谚云: “鬼尾回头望, 为官当宰相。”“鬼尾”即“癸未”谐音。离家 13 年后, 公元前 685 年在鲍叔牙力谏下, 被齐国君主齐桓公拜为相。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一次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在回忆自己与鲍叔牙的深厚友谊时, 管仲曰: “吾始困时, 尝与鲍叔贾, 分财利多自与, 鲍叔不以我为贪, 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 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 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 鲍叔不以我怯, 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 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 鲍叔不以我为无耻, 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鲍子也。”(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这是一段管仲前半生五次“败走麦城”的、精彩的“夫子自道”，也是迄今国史记载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管仲前半生文献信息。如何理解？也许在司马迁是曲笔，在管仲则是严于自我解剖。然而，在后世解读，似乎是一面镜子，也便成为见仁见智地评论管仲人格、人品的泉源。颇有趣味的是，当初鲍叔牙在推荐管仲为相时，在齐桓公面前居然列举了自己不如管仲的缺陷也有五处之多，岂非先贤心宅宽仁厚慈抑或成人之美之古风气使然乎？

二、管子其事

管子相齐 40 余年，一般认为管子被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姜姓，名小白，谥号齐桓公）之后，管子自然春风得意，实则不然。世界上没有谁可以轻易成功，建功立业者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齐桓公对管子的态度前后还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齐桓公问鼎之始，对用管仲问题与鲍叔牙并不一致，鲍叔牙力陈大义，好不容易才说服齐桓公接纳管仲。

第二阶段，拜相以后齐桓公考验管仲，故意自举其短。《管子·小匡》篇翔实记载了其事，但以梁启超转述说的比较简明扼要：“桓公即相管仲，自举其短，曰：寡人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者恶矣，然非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者亡众，不敏不及事。”（梁启超《管子评传》）管仲知道齐桓公的心思，就说：你这几条爱好确实不怎么样。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国君，最不能有的缺点是大事优柔寡断和暗昧无知，优柔寡断就没有群众威信，暗昧无知就会处事不公。

第三阶段，拜相后管仲提出齐国兴霸业的“基本国策”，齐桓公不肯，双方相持了很久，最终管仲不得不与之摊牌说，我当初不为公子纠死，就是为了齐国兴修霸业，现在你不干霸业，我干脆死了算了。管子以死相要挟，齐桓公被说得满脸流汗，才答应兴修霸业。

第四阶段，国策定了，具体怎么兴霸业？齐桓公与管仲的意见也不一致：齐桓公要立即兴兵动武，对外大动干戈；管仲则认为不可，而要先对内顺民心、安民意，教民休养生息，制定法令，民心顺，然后才可“使民”达到“进退行止”自如，即奠定国之心人和物质基础后，才可以霸天下。齐桓公显然这时还不能理解管仲兴霸业的战略意图，就把管仲“晾”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决策行动，派鲍叔牙和其他臣子率兵四处打仗，结果连遭败绩，最著名的战例如齐伐鲁“长勺之战”，被鲁人曹刿献策所击败。

这导致管仲“数年”似乎无所作为。但齐桓公的行为，已经危及到齐国

的兴亡,以致鲍叔牙老是跑来向管仲问策。管仲说,齐恒公最近有点小心眼儿,出的都是昏招,怎么办呢?只好让事实“上课”,促使他回到正路上来。管仲还对鲍叔牙说,当时幸好管鲍二人在齐国,而不是辅佐其他诸侯国,否则齐国就真是非常危险了。

这一阶段对于管子的事业至关重要。管仲在赋闲期间,实际上是在务虚——《管子》书中颇多经典的立国之论,譬如《经言》中的某些篇章以及《轻重》篇的一些内容或是这阶段的产物——规划齐国未来的蓝图,当然也过问一些国内的政务。

第五阶段,齐恒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碰壁之后,终于回到了管子的“正确路线”上来,于是齐国的事业从此步入了快车道。这就有了管仲为相以后的所谓“文道七年”。管子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管子·版法》)就是说,太急切的政令行不通,人民就会有外心。“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管子·戒》)就是说,治理齐国要用三年时间教育人民,用四年时间选贤任能,培养干部,用五年的时间备战,作军事准备。看来管子兴修霸业非常懂得并按照政治的规律办事。

三、管子的治国经验

管子用事实教育和说理教导相结合的办法渡过了与齐恒公君臣关系艰难的磨合期之后,君臣关系日渐融洽,齐恒公对管仲的俸禄、爵位和名望给予了更多的授权,使之倾心辅佐,推进治理齐国兴修霸业的进程有条不紊的发展。成功经验主要有:

(一)管子治理国家,两手抓——既主张顺民心,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又教化人民,让老百姓懂得礼义廉耻,遏制人性的弱点,不当老百姓的尾巴

管子说:“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饿之、渴之,用民者致之此极也,而民无可与虑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管子·法法》)。然后颁布法令,立规矩,明赏罚,让君王大臣率先垂范。管子治理国家,要求君王没有私心,大臣和国内贵族带头执行,法令和赏罚都要适当;不适当的执法用令,不公正的赏罚,只会适得其反,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法令的尊严,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国力衰微,乃至国家灭亡。所以管子说:“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管子·七臣七主》)“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下》)“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管子·君臣上》)

(二)管子治理国家,讲究发展生产,讲究遵循经济规律,体恤民生,爱惜民力

他从“兴本”,抓农业生产开始,同时要求农工商各司其职,各守其位;极大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国家对人民的索取不要太多,一定要量力而行。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指导国民生产,重权衡之术,用轻重之法,即利用货币杠杆活跃调剂经济市场,平衡国家物质生产的产品。管子认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兴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

(三)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治理结构,建设基层政权,寓兵于民,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

建立以户为基础的“伍、连、轨、里、乡”的基层架构,实行“三其国而五其鄙”、“制内政以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在改善老百姓生活的同时,让他们和谐共处,具有团结和奉献精神;合理农民税赋负担,“相地而衰征”,国家富足了,就要适当增加财政税收,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培养和训导国民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高度的奉献和服从精神,教导他们关键时刻全力以赴,为国出力,为强国称霸而战斗。就像管子所说:“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管子·奢靡》)

(四)管子在首霸春秋过程中,不穷兵黩武一味推行战争政策,而是采取以强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贸易、外交等综合手段,因对手而异,采取不同的征伐策略

对诸侯国,管子更喜欢使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主要使用经济手段,大打贸易战,不发一兵一卒。譬如利用高价收购“鲁缜”,促使鲁国逐渐形成以纺织业为主、单一的产业结构,而粮食供给纯粹依赖与齐国贸易来实现,于是齐国突然利用停止收购鲁缜和停供粮食,轻而易举迫使鲁国俯首称臣。管子还利用大量收购圈养野鹿的手段,诱使楚国国民放弃其农业生产,荒芜田园,粮食依靠进口。然后,齐国突然宣布停止收购野鹿,停止对楚国的粮食出口。楚国也就只好乖乖就范了。管子治下的齐国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做后盾,主要运用商战和外交,先后十数度会盟诸侯国,实现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前提下的“一匡天下”的统一大业,这样的事功,无论古今中外都堪称是奇迹。

最早对管子事功概括的历史名人,是比管子小 172 年的孔子(前 551 ~ 前 479),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两处记载孔子所重视的管子事功,并使用孔子

的概括,这就是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四、管子的精神遗产

管子具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功的政治实践和系统的思想理论建树。与那些人类文明史上,以“立德、立功、立言”推动历史前进,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名人相似,管子的思想学术以极强的现实性、经邦济世的政治实践性,总是让晚于他出生的人们获得不尽的教益和知识。

所谓管子思想学术的政治实践性意谓作为物化的管子思想学术,是管子相齐 40 余年的功业及其经验知识和智慧谋略的结晶。

梁启超认为,管子既区别于法国孟德斯鸠那样“政治理论家”,又不同于美国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实行家”,而要做到既是“政治理论家”又是“政治实行家”,是非常困难的,历史上极少有人能集二者兼而得之,但是管子做到了。管子的治国政治理论见诸于《管子》一书,因此其思想学术的形而上的一面,是不言而喻的,难点在于对其实践性的把握。

(一)管子思想学术产生的时代背景

殷商邦国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小国寡民”的联邦政体。周朝最终取殷商而代之,在国家政治体制上的进步其实并不明显,依然实行的是天子分封下的“八百诸侯,王国甚多”的联邦体制。周武王分封之后不久,病故,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引得周公旦被封在诸侯国的三哥管叔鲜(管子的远祖)和五弟蔡叔就认为越礼(所谓“践祚”)而作乱。以周公为首的周代统治者东征,平乱之后,并没有意识到中央权力过于分散的弊端,变本加厉地分封亲戚以为蕃屏。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周公分封 71 国,其中有 53 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两次分封,使周人暂时地巩固了在原属殷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扩大了周人的势力和影响,使周朝成为一个疆域超过商朝的松散的联邦制大国。

早从“三监之乱”平定之初,既非悲剧的结束,而是另一出人间大戏剧的开端——一轮轮更为惨烈、波澜壮阔的诸侯国相互讨伐、争霸的悲喜剧继续上演。“春秋战国”就是这场历史活报剧的总标题。

春秋初期,有一个阶段,诸侯邦国实力比较势均力敌,周代政治弊端没有充分显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8 世纪的管子时代。公元 7 世纪初,管子登上历史舞台,管子与他的好友鲍叔牙为首组建的齐国政治团队,辅佐齐桓公经过 40 年的武功文治,即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手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得了首霸春秋的历史性突破。所谓“称霸”,就是一个诸

侯国成为众多诸侯国的盟主,替天子行使管理诸侯国的职能。这是中国国家政治划时代的一件大事:管仲与齐桓公的“首霸春秋”意味着开始了中国原始联邦性质的宪政国体向多民族融合、大一统中华帝国体制迈进的历史转变进程。这个进程由于诸侯争夺霸业连续推演,最终由秦国实现了统一六国,建立了以秦始皇肇始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从此,中华民族国家尽管发生过赵宋被蒙元所取代,以及朱明为满清所取代的两次历史上巨大的政治波折,但是仁人志士爱国和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总是成为中华民族国家政治史的主旋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当代。

(二)管子思想学术政治实践性表现为一种破解周代国家政治难题的选择

管子的思想学术实质上是一种维护周天子宪政大一统统治的特殊表现形式。毫无疑问,作为实体和载体,一个小国在“诸侯自由政治竞争”的联邦格局下,根本不能发挥对天下大治(抑或天下大乱)的主导作用。要实现这样的主导作用,只能从一个诸侯邦国的自我做大做强开始。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周天子的诸侯国并不那么喜欢领土扩张,经常的情况是讨伐之后并不占领。一个类于当今“国际政治”的悖论产生了:欲行王道,必行霸道,即如果把维护周天子的宪政一统政治作为“王道”实现的话,那么把一个诸侯邦国做大做强就必然奉行“霸道”。而霸道与王道是水火不相容的,至少在孟子及其后儒家学者的观念中一直是这样永恒两极对立着。管子时代的主题,或者说管子当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就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的两难选择。管子破解这个历史悖论的策略,就是首先立足于一个具体的诸侯国政治平台,把一个邦国的方方面面的事情搞定,在齐国兴修霸业(霸道),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达到“匡扶周室”(王道)的目的。显然实现这样的目的,与其说是理论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一个实践问题。兴修霸业,是一种国策,而不单单是一种目标理论。管子是霸业兴修的学说和实践的第一人。管子认为兴修霸业并非就是穷兵黩武,为坚持这一点,他甚至不惜与齐桓公闹翻。管子的兴修霸业从“文道”开始,即富国才能强兵,安顿好内政,顺应民心,组织民众,教化国民是强国的前提。大国首先应当担当起对夷族骚扰反击和征讨的责任,对中、小国则远攻近交,尽量避免过多的军事打击。齐国首霸,给后起的晋国、秦国、宋国和鲁国等诸侯国树立了榜样。管子努力践行的维护周代大一统宪政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把历史恢复到传说中的三代所谓“理想国”状态——历史原没有“倒车档”。管子的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只是留下了一种大致的政治方向,就是治国

要胸怀天下,“以人为本”,有“大目标”,树立“大天下”的国家观念,这对当时“小国寡民”的诸侯自由竞争邦国时代的传统观念和现状是一次革命性的大突破。

(三)管子思想学术文本的政治实践性

集中反映管子思想学术的文本《管子》一书,几乎是远古政治的文本化或文献化政治的“活化石”。它记载的是管子时代齐国的重要政治过程和状况,而所有齐国的,乃至周天子治下邦国诸侯国的政治理念、政治对策和政治作为,都可以从《管子》中得以呈现。文集中有一些就是齐国朝廷的公文、实录,这些公文和实录,围绕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管仲。《管子》书中肯定有管子的亲笔文章(所谓“遗著”),譬如管、鲍出任宫廷教傅时期编写的教本、讲义,譬如《幼官》、《幼官图》以及那些“解”文等。由于时代久远,在朝廷实录以外,要确定哪些文字并非出于管仲手笔,近乎是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

《管子》一书,从《经言》到《轻重》诸篇,从《大匡》、《中匡》、《小匡》,到《水地》、《官山海》诸篇,指代的对象主要是齐国,但是,所涉及的内容却远远超越齐国一国之事,具有观照寰宇、总览天下的恢弘气魄。它们有的是高头讲章、治国纲领,有的是上疏,有的是政策条文,有的是宫廷实录,有的是会议纪要,有的是谈话记录,有的是事迹报告,有的是法律文告,有的是戒条规章……当然也有教科书式解说和一些形而上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思考,如卷一经言中的《形势》、《乘马》,以及《宙合》、《心术》、《白心》、《水地》、《四时》诸篇。

《管子》文本承载的不仅仅是后世意义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管仲)的著书立说,而且更是一部国家的、包罗周朝时代风云变幻的档案和文史资料的百科全书。

五、管子的思想学术贡献

管子思想学术,作为一个立体的、宏大的体系,其贡献主要体现为形势道哲学,轻重论政治经济学和人本和谐论社会学。其中形势道哲学,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础,也是理解整个管子思想学术的一把钥匙。

(一)形势道哲学

在中国古代,“道”最早就是哲学。“道家”就是哲学家。“哲学”是近、现代的外来词。

《管子》被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入国史,并首次称为“道家”。由于前四家以及其他几十种道家著作均大部分亡佚,成为当时“道家”

硕果仅存的“绝学”。

原始道学的源流,至迟可以追溯到姜太公。管仲和《管子》是最重要的传承者和集大成者。正如班固所言,“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或政治哲学学派的统称,“其放者”则偏离了原典,逐渐蜕变为神仙长命之术、炼丹修行之学,最终发育成为一种汉族本土宗教,而失却哲学本体精神。

管子哲学的素朴的唯物性和辩证性,首先体现在对“形”、“势”本体性的认识,及其对“形”“势”“道”三位一体的总体把握上。管子从万物万有的“形”与“势”的动态把握上,直接引申出“道”的这个抽象最高,从而也是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形”作为物质世界的可以为人的感觉所感知的外在形状;“势”作为物质世界可以为人的感觉所感知的动作状态。“形”与“势”所呈现的或所依本的内在规律或法则,就是“道”。

譬如,管子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什么是背道而驰?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什么是大道通天?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这段话背后真正的哲学意义正是“道”。

《管子》卷一的《形势》篇是管子思想学术的逻辑起点。管子一开始从具有“形”、“势”、“道”内容的此岸具体存在开始述说,让读者从“山”、“渊”、“天”、“地”,“春”、“夏”、“秋”、“冬”,“蛟龙”、“虎豹”、“风雨”、“贵贱”、“寿”的变与不变具象中,把握或悟出天地间万物万有“形势道”的真谛。由此,整部《管子》都可以隐约潜伏贯穿一条“形”、“势”、“道”哲学的红线。

管子指出:“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管子·形势》

“道”也存在于人伦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天下国家社稷的存在也有自己的“形”、“势”有自己的“道”,君王管理者智者或者寻常百姓,也要按照天下、国家、社稷、家庭的形势道办事,才能治理好天下、国家、社稷和家庭,否则就任何一样东西也治理不好。道的特点是什么呢?管子回答道:“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管子·白心》)

管子形势道哲学也突出政治维度,恰好说明真正哲学必然具有鲜明的

个案性。毫无疑义,管子哲学的个案关注点是政治利益、功利诉求和经邦济世,目标是“尊王攘夷”、“兴修霸业”、“一匡天下”。但是即便如此也要合于“形”、“势”、“道”,才能做得最好,取得最大成功。

本体论 管子是人类最早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580年前后)提出的“水是世界“始基”的观点还要早近一个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和概念如“精气”、“金”、“木”、“水”、“火”、“土”、“五味”、“五声”、“五色”、“阴阳”、“五行”等观念大都可以从《管子》中找到原初依据。管子哲学本体论是建立在万物万有之上的、运动的“形”、“势”、“道”。

管子认为“地”和“水”是万物的“本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管子·水地》)

管子哲学具有鲜明的唯物性,却并不亵渎神明,相反他的哲学里包含有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同时,保持对大自然背后力量的甚至对大自然本身的敬畏,就管子哲学的这一点而言,既可以做积极能动性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管子哲学的局限性。

认识论 管子承认人的知识来源于人心,他的“心术”论,是具有心理、伦理和美学色系的认识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

管子强调人的认识世界的可知性,但是他认为人的知识、智慧的获得,既有经验的积累,也有静观默想的成分,既有个人天赋方面的原因,也有神明赐予的原因。他的“白心”论,是主张人们认识事物需要有一颗纯洁、虚静之心,以排除那些私心杂念,方可参天地之化育。管子主张遵循事物内在规律办事:“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管子·白心》管子十分重视前人经验实践总结和学习继承,管子的“行”(实践)不仅包括物质的社会实践,也包括理论实践,甚至感觉实践的内容。

逻辑学和方法论 管子的逻辑学和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在管子的著述中表现很充分。以形式逻辑为主,也有很多辩证逻辑。管子的论述中概念、推理、分析和综合都运用的非常精熟。辩证逻辑推理也非常老道,譬如他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提出、推导、分析和结论。又如对国家财经渠道管理的“利出一孔”怎样,“利出二孔”怎么样,……“利出多空”(《管子·国

蓄))怎么样的推导,非常具有说服力。大量的哲学范畴都被创造出来,并加以分析推理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这些逻辑与其说是一种主观思辨逻辑,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实践支撑的客观辩证逻辑。

历史观 管子提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猜测,也是管仲天才的发现。他实践地把握与荣辱观念相联系的经济生活与人的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管子从最高统治者或者国家利益出发,认同先王和明君的历史主导作用,即英雄和民众共同创造历史,但又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相反他自己就是个人奋斗、创造历史的典范。为此他把自己的“生死”与“天下”、“社稷”和“宗庙”的存亡结为一体。他继承先王和圣者的治国智慧,以用民为目标而“牧民”,权衡利弊,也体恤人民,尊重人民,听取人民的呼声,教诲人民,改变人性弱点,既不否定君王贤臣是国家兴衰的原因,也把“以人为本”当作兴修霸业的出发点。管子不墨守成法,勇于革新,开拓进取。

美学 管子对美的存在具有卓越、独特的认识,他认为美与丑都产生于自然即“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管子·水地》)管子认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这可以说是人类对自然美最早认识的经典格言。因此管子的美学基础是开放的、宽广的,如说“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管子·形势解》)管子对美的艺术功能也有独到见解,对音乐的内律具有很强的认知和创作能力。比如囚鲁归齐途中,管子自编《黄鹄歌》,以短促的音乐节拍,促使兵士加快行进的速度,摆脱了鲁军的追杀。管子美学思想具有实用和伦理主义的倾向。譬如他说女人“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一方面,管子认识到人性喜欢美丽的东西,美妙的音乐,美味的食物;一方面,管子认为不能一味迁就人的这种好逸恶劳倾向,治国要用法律的形式矫枉过正,以教育人民坚决听从国君及其统治者的调遣和管理。

(二)轻重论政治经济学

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和政策,是相统一的,又密切结合实践,并且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

轻重价值论 “轻重”是管子经济学抽象出来的核心概念和核心范畴,也可以理解为轻重规律。管子认为,自从人类发明火以来,世界上就存在价值现象。即“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管子·揆度》)。又说“散则轻,聚则重”(《管子·国蓄》)。就是国家的钱力分散,价值就减少,财